

痛 史 明 鉴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及其教训

华 原

北 京 出 版 社

痛 史 明 鉴

Tongshi mingjian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及其教训

华 原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印刷厂印刷

*

850×1163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110,000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10

ISBN 7-200-01203-3/10·84

定价: 2.10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第一次泛滥——从“北京之春”泛起的 寒流	(1)
播乱西单墙，泛起自由化	(2)
“理论风云”——思想混乱初起	(5)
白桦和他的《苦恋》	(10)
人生价值观的第一次大讨论	(14)
二、第二次泛滥——精神污染	(17)
论坛“怪影”——人道主义、异化热	(17)
“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王若水	(29)
文艺创作中的错误倾向	(33)
人生价值观的第二次大讨论	(36)
三、第三次泛滥——从理论攻势到政治攻势	(39)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升级	(40)
从“补课论”到“为资本主义平反” ——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种种	(48)
从“过时论”到“超越论”——在坚持、 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产生的理论倾斜	(52)
从“为自由正名”到“为资产阶级自由 化正名”——在民主、自由、人权等 问题上所造成的思想混乱	(62)
从地下的咒骂到公开的攻击——丑化、	

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辑录·····	(72)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方	
励之、王若望、刘宾雁·····	(74)
“文化热”中的思想混乱和政治攻势·····	(87)
人生价值观的第三次大讨论·····	(93)
四、第四次泛滥——从煽动学潮到策动	
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	(103)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总纲领·····	(104)
私有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	
纲领·····	(108)
实行多党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	
治纲领·····	(116)
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理	
论基础·····	(118)
“新启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化	
战略·····	(123)
通向动乱之路·····	(128)
五、痛史明鉴——经验和教训 ·····	(136)

一、第一次泛滥—— 从“北京之春”泛起的寒流

第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1979年前后），发生在我们党着手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1979年前后，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在经历着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理论战线上，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祖国的四化大业在拨正船头之后，正面临着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局面。可是，就在我们着手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起却对全国人民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提出了挑战。他们把我们党大力倡导的解放思想的正确口号加以歪曲，打着反对“两个凡是”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在我们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制造新的思想混乱。1979年春天，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本来是一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会议，可是有的人却把拨乱反正的正确命题加以歪曲，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的方向；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王若水等人在会上相继发难，制造混乱。与此同时，务虚会外也出现

了一定的混乱，有的人继续使用在十年动乱期间使全国人民深受其害的“四大”作为武器，掀起了一场被称之为“北京之春”的风波。

播乱西单墙 泛起自由化

1978年10月下旬，在北京西单墙、王府井大街、天安门广场陆续出现了一些有严重错误倾向的大小字报、诗歌、漫画，使得初步形成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又重新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利用我们党和国家在十年浩劫中所造成的创伤，利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时期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向党和人民发难，在呼吁“民主”、“自由”、“人权”的喧嚣声中，有的人走上街头、发表演讲、开展辩论，进行蛊惑宣传，煽动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相继出现，并向全国一些地方蔓延。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非法组织的头头频频活动于地上、地下，搅起了一场一定范围的风波。从西单墙上发出的与四化大业格格不入的不谐和音与非法组织的组成、宗旨、活动情况来看，这明明是一股与我们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背道而驰的逆流，但却受到了国内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及国际反动势力的青睐，把它称之为“‘北京之春’民主运动”。

从所谓的“北京之春”吹来的并不是春风，而是倒春寒的寒流。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出现的自发组织有80多个，其中有些是由少数坏人控制和把持的，如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贵州的“解冻”等。这些由少数坏人控制与把持的组织，从它们的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违犯国家宪法和法

律的。

它们打着要求“民主”、“自由”、“人权”的招牌，提出自己的宣言、纲领，公开进行反革命宣传。例如：

“解冻”在其《宣言》中声称要“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提倡学习基督教精神”，“建立起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公然叫嚣，“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威信”，“打倒共产党就是人心所向”，“要改变制度”，“用资本主义管理国家”。还声称“要利用目前社会矛盾，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彻底摧毁社会制度”。^①

“上海民主讨论会”有的成员发表演说诽谤社会主义是“瘪三主义”，提出要“从中央到地方调换人员”。他还说：“当局有十只指头，我们放出十一只跳蚤，让他们应付不了，一只也捉不住，越乱越好。”

“探索”散发号外指名攻击邓小平同志是“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其成员魏京生张贴小字报诬蔑“党中央是另一个政治骗子集团”，社会主义是“封建君主制”，叫嚷“要把现阶级赶下台”。^②

与此同时，他们到处串联，制造事端，煽动闹事。北京的傅月华同“中国人权同盟”勾结在一起，煽动和串连上访人员，打着“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横幅，游行示威，到新华门前请愿，围观群众达几千人，阻塞交通一小时，二千多辆机动车被迫改道绕行。“中国人权同盟”的一些人，曾于1979年2月中旬策划在西单“民主墙”召开万人控诉大会，到中南海请愿。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人企图借助国外势力达到他们的目的。有人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写信，乞求支持

^① 原文如此，“社会制度”指社会主义制度。

^② 原文如此，“现阶级”指领导阶级。

人权运动，公然要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探索”等组织30多人与外国人有联系，每当他们贴出大字报即给外国人打电话，通知他们去看。“探索”成员魏京生把我军毙伤越军一万多人的战报以及自编的我军指挥员、战略意图等材料，出卖给外国人。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都发现，这些组织做好了准备，要在1979年“四五”煽动闹事。

从“北京之春”泛起的风波，虽然在当时的波及面并不大，但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不容低估，对四化建设的破坏作用也十分严重。饱受十年动乱之苦的全国人民当然不能允许刚刚形成的大好局面被破坏。党和国家代表人民的意愿坚决取缔西单墙，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继续蔓延和泛滥起到了一定的遏制的作用。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对那些参与“北京之春”的绝大多数人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教育，投入到四化建设中来。但也有极少数人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一有机会便冒出来闹事。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转移到国外。1982年在美国创办的“中国之春”，就与1979年“北京之春”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中国之春”的许多成员来自“北京之春”的活跃分子。1979年“北京之春”闹事期间，有一个地下艺术和政治团体。后来它的许多成员移居海外，十年后又卷土重来。1989年1月12日它的部分成员在香港举办“星星画会十周年画展”，2月3日又在北京公寓举行义卖活动，为资助魏京生等罪犯家属筹集资金。这个组织的头头还宣称他已写了《重审魏京生》的剧本，准备在法国公演。1989年2月4日，方励之、陈军（原上海非法组织“民主之声”骨干分子，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所谓“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就是一次为“北京之春”追魂、妄图制造新动乱的会议。至此，1979年“北京之春”的所谓“民运人士”与1989年的动乱精英会师了。当年在“北京之

春”期间的活跃分子，如陈军、北岛（诗人，曾在1979年发起自发刊物《今天》，任主编）任晓町等，都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这场动乱和暴乱的鼓动者。

“理论风云”——思想混乱初起

在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理论战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左”的错误，对于推倒“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主流之中有逆流。理论界的少数人背离了理论工作的正确方向，与“北京之春”的鼓噪相互配合，在报刊上制造思想混乱。对他们来讲，批判林彪、“四人帮”也好，反对“两个凡是”也好，都只不过是“借力打力”，借着我们纠正自身的错误的时机反对我们要坚持的正确方向。我们分析和纠正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他们攻击和反对的却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本身。在报刊上，在一些理论工作的会议上，他们以各种名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坏。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议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可是，正像马克思当年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其鲜明的立场激怒了所有的资产阶级一样，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也以其鲜明的立场激怒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鼓动者，把他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①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的人把“四项基本原则”称之为“四根棍子”，有的人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1979年三月份称之为“三月黑风”，就在“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不久，王若水在1979年8月14日到上海华东

^① 见《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

师大作报告说：

我不太同意说四项坚持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先验的东西，不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有了。都有个认识过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承认到承认，从不理解到理解，让人去探索，允许人去讨论，甚至也允许人去怀疑。有人主张，在两个“凡是”的条件下，进行思想解放，那样，张三有个前提条件，李四有个前提条件，条件就多了，哪个前提条件正确呢？还得考查一番。要坚持四项原则，还得让人家提问题，讨论问题。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允许人家提问题。你说，四项原则是正确的，总要讲出个道道来，要坚持四项原则，就要让人首先解放思想。没有思想解放，就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解放思想的关系，是否可以划个框框，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下，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才能解放思想？我说恰恰相反，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这次报告中，他还说：

把四项原则作为前提条件，就会妨碍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理论版（即第五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与四项基本原则唱对台戏的文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洪林的系列文章：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
1979年5月9日）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1979年6月22日）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人民日报》，1979年10月5日）

这几篇文章，并没有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作出任何科学的解释，而是提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其实质是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他的基本逻辑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标榜过社会主义，就有理由对社会主义表示疑问；因为“四人帮”提出过“全面专政”，就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专政”；因为林彪、“四人帮”曾经盗用过党的领导的名义，“有人对党的领导有怀疑”就“很自然”。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李洪林公然为怀疑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辩护，他说：“不要一听说有人怀疑社会主义，赶紧就去批判，因为单是‘怀疑’本身不一定是坏事。”照这种逻辑，四项坚持岂不就变成了“四项怀疑”？逐项地去怀疑，还有什么坚持可言？像这样一些肆意制造思想混乱的文章，理应受到批评和抵制。对这些批评意见，李洪林一直耿耿于怀，一有机会，便要出来较量一番。1983年，我们党反对精神污染受挫，李洪林出版了《理论风云》一书。在这本书中，李洪林重新发表了他这三篇引起严重思想混乱的文章，并且对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横加指责，说这些批评是“从背后搞突然袭击”，是“扣帽子”、“打棍子”，是“理论风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重新制造思想混乱。1989年，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度严重泛滥之时，李洪林感到时机已到，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1期上发表了这组系列文章的四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前言中说：

——1979年，我写过三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

报》：《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这三篇文章曾经引起很大的风波。“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被列入“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

——现在发表的，是这个系列文章的第四篇。有人建议把标题改一改，以免引起联想，发生麻烦。但是我觉得，关键是内容，而不是标题。况且这本是系列文章，正要引起人们联想，为什么要回避呢？

在这里，李洪林生怕人们看不懂他这组旁敲侧击、播乱全国的系列文章，特意提醒“正要人们引起联想”。四篇文章，针对四项基本原则逐项发难，人们能联想些什么呢？如果联想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所引起的严重的思想混乱与1989年春夏之交的社会动乱骤起，如果联想到在动乱发展到十分严重的时刻李洪林从后台跳到前台，于1989年5月14日会同戴晴、于浩成等12位动乱精英到天安门广场发表的《紧急呼吁》，如果联想到李洪林在这十年来发表的《“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等一系列有严重错误倾向的文章，不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李洪林从1979年开始写这组系列文章的初衷，就是与四项基本原则唱对台戏，蓄意制造思想混乱吗？

什么是“理论风云”？用李洪林的话来说，“理论风云”，“既包括理论是非的争论，也包括它所引起的风波”。^①其实，正常的争论，是不会引起风波的，也不会兴起“风云”的。十年浩劫之后，党和国家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毅然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心一意搞四化，

^① 见李洪林所著《理论风云》一书，第9页。

也不会再起风波的。那么，又是谁在刮风、兴云、掀起波浪呢？历史记载得清清楚楚，不断兴风作乱的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章中说：

如果发表反革命的意见，也仅仅是一种意见，不等于反革命行为，只能说是思想上的论敌。

文章发表后，美国和香港报纸很快作出反映，说作者的目的是对魏京生判罪提出质问，是反对用武力手段对待不同政见者。

在这前后，郭罗基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谁之罪？》，借口张志新被杀害事件，提出改造社会环境，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于《文汇报》的《评所谓“信念危机”》，为现实中发生的对一些基本信念产生动摇的现象提供理论依据；发表于《中国青年》杂志的《谈怀疑》一文，蛊惑青年怀疑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一篇篇的文章发表出来，确实把一个好端端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搅得“晴间多云”，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香港有一家杂志送给郭罗基一顶桂冠——“中共思想解放的先锋”，说他“感情充沛、理论严谨”，“举起万钧铁锤，向着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超级专政打去”。

诚然，郭罗基也经常会在报刊上发现一些同情者，这主要的就是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搅起的错误社会思潮，1980年12月，《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①，说“学术自由根本不存在出格不出格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君临一切思想王国里的独裁者，也不是一切科学结论正确与否的准绳”，“学术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批驳、否

^① 《学术自由谈》，《读书》杂志1980年第12期。

定，都应当允许其存在”。与此同时，在一些理论研讨会、座谈会上，有些人的发言就更加肆无忌惮，有的人根本否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存在，有人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不科学，说“为什么要给自由化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呢？”还有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有意见也可以提，这不存在针对谁的问题。对这样一些干扰安定团结的看法，当然应该进行批评和教育。如果听任这些引起混乱的社会思潮继续蔓延，“理论风云”就会发展成为政治风云。

白桦和他的《苦恋》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紧密团结并依靠文艺战线上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总结了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文艺路线，同时也逐步纠正我们党在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方向，重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的方针、政策。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打破了在“左”的错误方针的禁锢下形成的那种“万马齐喑”的不正常的局面，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观众普遍的欢迎。有的作者在创作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新的、有益的探索，文艺理论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例如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电影创作》1979. 7）、中篇小说《飞天》（《十月》杂志，1979. 3）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上海戏剧》1979. 7）等，有的作品有严重错误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不容低估。其中引起波动最大的是白桦与他人合作的电

影文学剧本《苦恋》（后来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未公演）。这个剧本表现的是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说他是“一个痴恋着祖国和人民的苦苦的恋人”，解放后从海外回来，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打成黑帮，亡命苇荡，吃生鱼、野果，挖田鼠洞吃田鼠粮，过着野人的生活。在山穷水尽之时，他结识了一个藏身在这片苇荡的一个惯偷，偷东西给他吃，偷画笔、颜料供他作画，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惯偷竟然是个有家难回的史学家、一级教授，和他一样是受迫害的人。教授被捕入狱后，凌晨光断了粮，饿死、冻死在丛林里。作品中把那些使祖国蒙受苦难的反动势力与祖国混为一谈，把祖国的凶恶的敌人的一切罪行加到祖国头上，把祖国涂抹得漆黑一团，看不到一点光明。剧中主人公的女儿在出国前诘问凌晨光：“我爱祖国，可祖国不一定爱我”，“你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问得凌晨光无言以对，借剧中人之嘴说出了作者要说的话。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爱国不过是一种“单恋，单相思”，投之以桃李，报之以血泪。结尾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的主人公在雪地上死去，只留下他爬过的痕迹形成的一个大问号，天空中出现一个太阳，后面加上了一连串的虚点，用春秋的笔法对知识分子执著的爱国痴情表示了巨大的怀疑，暗示人崇拜神、神愚弄人和迫害人的历史永无止境。剧本发表以后，被译成日、俄、英等文字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1981年4月，《解放军报》对《苦恋》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可是有的人却借题发挥，把正常的批评说成是整人，有的人则通过不同渠道对白桦表示同情。受了批评之后，白桦反而成了一些人心目中的“英雄”，白桦本人也自鸣得意，欣然命笔写了《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一文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被文艺界称之为“白桦风波”。这场风

波由国内冲击到国外，由内地波及到港台。香港有的不怀好意的报纸引用了辛弃疾的词“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作为大标题，为白桦鸣不平。意思是说刚刚百花齐放，可是又要收了，春天归去了，像这样，国家还能经受几番风雨？还散布说“《解放军报》打了败仗，韦国清地位不稳了”。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界的影响相当严重。1981年8月3日至8月8日中宣部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提出要纠正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的现象，并对《苦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评。1981年9月《文艺报》发表了唐因、唐达成同志合写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对《苦恋》的严重错误和缺陷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人民日报》10月7日转载了这篇文章。12月23日，白桦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如果白桦真的能接受批评，党和人民仍然寄予期望。可是白桦却辜负了人民的期望。一方面，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推着他继续往错误的路上走；另一方面他本人也越来越表现出与党和人民的离心倾向。“北京之春”这场风波闹起来之后，他曾经说过：“宁肯歌颂‘西单墙’上的一块砖头，也不歌颂‘救世主’。”其后，他一直沿着与党和人民背道而驰的路子走下去，每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时，他都呼有所呼。一有机会，便按耐不住要出来表演一番。1989年2月，当法新社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诬蔑和攻击，毫不隐讳地说：“和其它理论一样，马列主义理论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自有其地位，但终究已经过时。马列主义的精神和理想已经死亡。没有必要再对它抱持一厢情愿的态度。”到此时，他已经改变了原来那种含沙射影的惯用笔法，把他的真实面目不加掩饰地暴露在读者面前。他后来的一系列表演，也使我们看清了“苦恋”的真实创作意图。

和《苦恋》同时出现的，还有叶文福写的一组《将军诗》，也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1979年8月，叶文福发表了《将军，不能这样做》，说一位将军为了给自己修房子，花了几十万元外汇。1980年冬，又发表了《将军，好好洗一洗》一诗，这首诗是围绕着一个将军用近一万元人民币在地下室安了一个现代化澡盆展开的。他写道：

“是的，将军，你真该好好洗一洗——就是死了，也该留一具不算太脏的尸体！

但不该用这样的澡盆——这都是标准的现代化呀，现代化岂是你随意强奸的少女？”

“将军，你应该到历史长河里去！

先见识见识，再洗它个舒心快慰，洗它个酣畅淋漓！

那里有刘宗敏无头的尸体，

那里有罗伯斯庇尔斑斑的血迹！

那里有无数至高无上的帝王自缢的绶带，

那里有无数头戴花翎的将军最后的泪滴！”

“且回头看昨天不幸的历史，秦始皇的尾巴一直伸进了我们党的会议！”

在这组诗里，他用自己杜撰的故事，丑化党的形象。与此同时，他还就他作品中虚构的人物的真真假假的问题上制造思想混乱，一会儿说他写的人物是虚构的艺术形象，一会儿又说真是真人真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事实上，《将军诗》的锋芒不是反对特殊化，而是借题发挥反对党的领导。他甚至当众谩骂毛泽东同志，说现在的中央领导护着毛主席，你们这些人捧着毛主席，将来我们起来要打倒毛主席。